

护国时期朱德同志与范石生等合影，前排左起：金汉鼎、朱德、杨蓁、范石生等。

www.ertongbook.com







1.一九二三年冬，孙中山大元帅授予范石生上将军衔时摄于广州。

2 一九三六年夏摄于庐山。

3 一九三九年三月初，摄于昆明。

1 | 2
3

目　　录

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节录）……朱　德（1）

范石生事略……范木兰 范亚兰（3）

朱德与范石生的统一战线……刘学民（33）

和范石生建立统一战线……赵　镕（46）

朱德与范石生……马伯周（63）

第一次滇桂战争中的范石生……本编辑室（81）

我所知道范石生的几件事……严中英（94）

抗日时期范石生在王家桥……王志清口述 梁宝成整理（104）

我所知道的范石生……王召德口述 目　生整理（106）

滇军第二军战史……范石生口述 许崇勋笔记（110）

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

摘自《云南日报》1982.8.1第一版

朱　德

摘录

三

南昌起义前，驻在湘南的范石生第十六军同我党保持着统一战线关系，该军内仍然有我们党的组织，范石生也有同我们联合一起进入广东之意。南昌起义后，部队南下时，恩来同志就给我们写了组织介绍信，以备可能同范石生部发生联系时用。范石生同我也有旧关系，我们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时是同学，并且一起参加过辛亥革命。当我们进至上堡后，范石生就主动派在他部队中工作的共产党员韦伯萃来同我们联系，希望同我们合作。我们经过党组织的讨论和批准，同意同他合作，就签订了协议。然后，我们的队伍就开到湘南的汝城，同范石生部实行合作，我们用了他一个团的番号伪装起来。

我们同范石生部合作是有条件的。谈判时就先讲好了：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党什么时候调我们走，我们就什么时候走；他给我们的物资补充，完成由我们自己支配；我们的内部组织和训练工作等，完全按照我们的决定办，他不得进行干涉。事实上也是这样执行的。例如，我们进到广东仁化时，还是照旧打土豪，杀了几个地主恶霸。又如，为准备湘南暴动，我们就在汝城召开了衡阳所属各县县委

书记会议进行讨论和布置。再如，黄绍竑要进攻范部时，范要我们担任后卫，我们因而得到了范部遗留下来的大批物资，补充了自己。所有这些，都说明我们的行动是自主的，不受限制的。

当时同范石生合作，对我们来说是有好处的。第一，可以暂时隐蔽目标（我当时化名为王楷），求得休整的机会，待机行动。第二，可以得到物资补充。合作时，他给我们发了两个月的军饷，补充了被服弹药等，我们临走时，他又给了我们几万元现洋作为路费。一九二七年十二月，我们接受了党的指示，去支援广州起义，行至途中，听说起义已经失败，我们就在韶关停下来。不久，我们脱离范部转入湘南，组织湘南暴动。我们临走时，范石生还给我们写了一封信，表示他的诚意。我记得大意是：一、"孰能一之？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注〕；二、为了避免部队遭受损失，你们还是走大路，不要走小路；三、最后胜利是你们的，现在我是爱莫能助。

呼石军次呈朱德将军

马列瞻襟愫，胸藏百万兵。
长缨为民请，大道以天行。
业窥麒麟阁，声高细柳营。
北江风雪夜，温盏慰生平。

严中英于韶关
1928年元旦

〔注〕参见《孟子·梁惠王上》这里的"一"是统一天下的意思。原载《云南日报》1982.8.1.第一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范石生事略

范木兰　范亚兰

峨山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将在《峨山彝族自治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出版人物专辑，向我们约稿。我们撰写了先父事略，以缅怀先父的一生并以育后人。这是我们多年来未能实现的愿望，在此谨对峨山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为我们提供这一机会及丰富史料，致以衷心的谢意。

一

先父范石生原名石僧，后改为石生，字小泉，号小翁，原籍云南河西小街（今峨山彝族自治县小街镇），后迁住峨山县城。一八八七年（清光绪十三年，丁亥）六月十八日（农历五月初五）诞生在一个世代以教书为业的家庭。娶峨山县周姓女为妻，周氏多病，早年去世。我们姊妹的生母名张泽玉，永善县人，一九八〇年在昆明去世。我家自高祖范鲲（字西溪）、曾祖名彤轩，祖父宗濬（字禹门）均以教书为业。祖父为前清举人，曾任开化府（今文山）训导（相当于现今的县教育局副局长）。父为长子，排行第三，上有二姐，下有三弟一妹。家里人口众多，且无恒产，仅靠祖父教书的微薄收入维持全家生活，家境十分清寒。祖母周氏，是峨山窑头上（今挂榜村）人，父及

叔父皆由祖父亲自教读。父幼时，聪敏好学，生活俭朴。大伯祖宗濂（字子泉）是副榜准贡，学识渊博，亦以教书为职业，办过河西西乡古城山“乐育书院”，远近闻名，就读者极多。大伯祖精通中医，晚年在峨山县城开业行医。父稍长即从伯祖学中医，在店中熟习药物，遂得家传。由于先父攻读刻苦，十六岁就考中秀才，随即补廪。清废科举后，到昆明考入优级师范。因该校前身之一部份是省会师范传习所，学生为各州、县所考送，所长及教员大多在日本留过学，受过孙中山革命思想的薰陶。多数为同盟会员。后来便以该校为基础，设立“滇学会”。父在此校读书期间，受教师影响，逐步树立革命思想，积极参加反清活动，加入了同盟会，并联络各校学生组织敢死队以期为革命献身，成为同盟会中的强健分子。优级师范毕业后，先父被分配到普洱任教。不久，因患哑瘴回峨山，病势严重，幸得玉溪朱姓名医救治，得以痊愈。病愈后，于一九〇九年（二十二岁）到昆明另谋生活。

先父在昆遇到李鸿祥，因李曾在大伯祖办的乐育书院读过书，后来又聘祖父到玉溪龙山开馆讲学，是大伯祖和祖父的学生，与父相交甚厚。此时，李鸿祥刚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任云南新军七十三标教练官。经李介绍，父到三十七协协统蔡锷部任文书。在此期间，父目睹清室衰朽，丧权辱国，遂产生弃文从武，报效国家的思想。

几个月后，李鸿祥兼任云南讲武堂教官，并参与云南讲武堂行政事宜。不久，讲武堂招生，李鸿祥对先父说：“清室腐朽，丧权辱国，民不聊生，作文书工作非长久之

计，何不投考讲武堂？！”此话正合先父之意，遂欣然报考，被录取后才告知祖父，祖父为此事甚为不满。先父入讲武堂后，被编在丙班与朱德、杨蓁同学。由于当时云南扩充新军，下级军官十分缺乏，便选拔优秀学生百余人，编为特别班，加紧训练，提前八个月于一九一一年（即宣统三年辛亥）夏初毕业，以应新军补充军官的需要。先父与朱德、邓泰中同被选到特别班，时年二十四岁。

在讲武堂期间，先父除了认真学习外，还积极参加各种革命活动，经常与朱德、邓泰中、杨蓁、金汉鼎、田钟谷等人在一起讨论怎样发动革命起义等问题。彼此志同道合，感情甚笃，遂结为金兰之交。这是先父后来能与朱德合作建立反蒋统一战线的基础之一。

二

一九一一年先父从讲武堂毕业后，分配到新军十九镇七十五标任见习班长，见习期满后，转为少尉排长，不久又升为中尉排长。是年十月十日武昌爆发起义，风声所及，全国震动。在云南的同盟会员加紧作起义的准备工作，先父和杨蓁、邓泰中等人一起，日夜奔走，在驻昆新军中广为联络，以通声气，特别是在巫家坝的步炮两标（七三、七四标）中争取了不少革命的支持者。十月二十八日（农历九月初七）蔡锷、李鸿祥等邀集谢汝翼、刘存厚、杨蓁、邓泰中及先父等十余人在唐继尧住武成路寓所作最后一次密会。决定十月三十日起义，并公推蔡锷担任起义军总司令。十月三十日蔡锷到巫家坝，组织并率领新军七十

四标起义，因杨蓁与先父事前对该两标官兵已作好秘密联络，故由他二人带手枪随同，辅助蔡锷掌握部队，如遇反抗，即由他们排除障碍。后因北较场七十三标将起义事机泄露而提前几小时进行，蔡锷闻悉七十三标已提前发动，即令炮标管带谢汝翼宣布起义，先父和杨蓁二人一直跟随蔡锷左右，并帮助蔡锷顺利掌握了部队。当时两标整顿队伍，饱餐之后向昆明城出发，先父亦随之到起义军司令部。在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下，清廷在云南的军政要员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十九镇兵备处总办王振畿腿伤后拼命逃跑，被张开儒抓获；镇本部参谋长杨蕙祥也被诱来司令部受擒。此时在司令部待命的先父看到这两个阴险毒辣、一贯反对革命的家伙，不禁拔出手枪，和在场的讲武堂学生彭肇康等一起将王、杨当场丛枪击毙。起义军占领昆明后随即成立云南军都督府，推举蔡锷为都督，时为农历九月初九日，故名“重九起义”。

重九起义胜利后，为了扩大胜利成果，都督府派军光复滇南，时先父在陈天贵炮兵中队任一排排长，随军南下。在临安与七十五标教练官赵复祥（后改名为赵又新）发动起义，驱逐统标罗鸿逵，于旧历九月十一日光复临安。旋即再南下攻克个旧、蒙自，所向披靡，清军总兵不支，溃逃入越，滇南随之光复。蒙自光复不久，陈天贵奉调回省，升先父继任中队长之职。然尚未就任，适逢河口督办许德芳解送饷银五十万两往昆明，路过蒙自，被赵复祥截留三十万两入蒙自道库（即军械局）。是时蒙自新军成分复杂，赌风甚炽，不逞之徒闻此巨款，即密谋了并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猛勇"为口令的抢银兵变。当夜全城居民关门闭户，只听到枪声和呼喊"猛勇"之声，翌日天明以后，乃知赵复祥军为抢银而发生了哗变。先父为人刚正不阿，带兵纪律严明，时率部驻扎于蒙自西门外大街西林寺上侧的一个汤姓大马店中。他得到抢银的消息后，立即集合士兵训话，晓以大义，并将店门关锁，约束士兵不准外出趁火打劫。赵复祥部多数官兵抢得银两后即四散离去，赵也出走江西。省方急派罗佩金率李植生大队赴蒙自处理善后，将原赵部所属余留官兵带回昆明改编，先父一同返省，编入顾品珍部，升任上尉连长。

三

一九一四年，先父任滇军步兵第七团副团长，所部驻昆明北校场。他看到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刺杀了革命党人宋教仁，以及之后的种种倒行逆施，对袁极为不满，常在本团官兵中宣传民主共和，传播反袁思想。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步伐加紧，云南革命党人和军队中的中下级军官的反袁活动随之高涨。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蔡锷秘密回到昆明和由日本归来的国民党人李烈钧与唐继尧等共同通电讨袁，宣布云南独立。随即组成三路护国军讨伐袁世凯，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出兵川黔；李烈钧任第二军总司令，出兵广西；唐继尧任云南都督兼第三军司令，留守云南。第一军下属三个梯团，赵又新（即赵复祥）的第二梯团和顾品珍的第三梯团是第一军的中路，进攻四川泸州。先父在顾品珍梯团任营长，亦随军

入川。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袁世凯在护国军的打击和全国人民的反对下，被迫宣布取消帝制。顾梯团在简阳大败川军周骏部后，进驻成都，先父因屡立战功，晋升为炮兵团长。入成都后不久，第三梯团改编为第六师，顾品珍改任师长兼成都卫戍司令，炮兵团被併编，先父升任顾的师参谋长，因他的作风、主张与顾格格不入，常与顾发生矛盾，不久便离职回滇。顾对先父十分恼怒，致电唐继尧谓："范石生回滇后不要委官任用。"先父回滇后与同学钱开甲合买了昆明西郊王家桥的八十多亩田地，躬耕垄亩，自行劳作。唐虑及先父在军界的声望，仍委以没有实权的少将参议。不久，唐继尧为了监视四川顾品珍部，借口增援，派邓泰中、杨蓁两个纵队赴川，请父以少将参军长名义，随邓出川，实际上是邓纵队的参谋长。邓对父言听计从，指挥处理部队军务无彼此之分。后来，滇军被川军驱逐，邓部由叙府（今宜宾）回到昭通，邓被唐继尧裁撤，将原来的十六团等部队拨归昭通守备司令蒋光亮指挥。一九二一年二月顾品珍发动倒唐之役，时先父与邓已将兵权交蒋光亮，自行回昆。行至东川（一说会泽）接到杨蓁相约反唐的信，父乃再返昭通，说服十六团第一营长徐德，及在绥江的第三营营长杨廷培，扣留了第二营营长华封治，驱逐了十六团团长周怀植，掌握了该团的兵权，称定滇军后备军司令，宣布响应倒唐。顾品珍战胜唐继尧回到昆明当上云南省督军后，对父的作为颇为不满。幸得金汉鼎、邓泰中等人大力维护，顾取消了父之司令，另委他为十六团团长，拨归昭通警备司令蒋光亮指挥。一九二

一年秋冬之间，先父被调离蒋光亮部到宣威剿办秃头梁子刘毛二等土匪，在剿匪过程中，增加了枪炮，扩充了队伍，成立了新兵营。

四

一九二一年底，唐继尧企图回滇复辟，顾品珍此时已受孙中山任命为北伐军滇军司令。顾虑及唐回滇的风声日紧，乃先后派邓泰中率部参加援湘，並于同年十一月十日发出北伐通电，接着又于十八日呈电孙中山大总统云："刻已任命范石生为北伐先遣军司令，杨希闵为北伐第一路司令，杨蓁为北伐第二路司令，，金汉鼎为北伐第三路司令，各率所部集中待发。"顾根据派往广西坐探提供的情报，断定唐回滇路线将经贵州黄草坝，就以北伐为名，调整部署部队，率部到滇黔桂边界江府一带构筑工事，对贵州方向设防。翌年二月，唐军突然从广西入滇，直趋开化，由于对唐入滇方向判断的错误，顾军主力不在这个方向，无力阻挡唐军，情况顿时紧张起来。顾品珍仓卒将指挥部移到路南天生关，一面慌忙将先父的先遣军改为后备军，西调宜良集中待命。唐收买土匪武装吴学显部作内应，突袭路南顾品珍指挥部。未几，顾被吴学显部击毙于天生关鹅毛寨，唐继尧遂再坐镇云南。

顾品珍死后，其部属除一部份投唐继尧外，其余分为两路，一路由副总司令金汉鼎率领入川，一路约万余人，由副总司令张开儒率领，退往曲靖、宣威，开到贵州盘县集结，打算继续影响孙中山先生的北伐号召。张开儒以总司令

身份，致电孙中山表示愿为北伐前驱的忠忱之意。并将其率部整编为杨池生、杨希闵、杨如轩、范石生和蒋光亮五个旅，先父任第八旅旅长，向桂林进发，欲与孙中山会合后参加北伐。时孙中山先生已由桂林回到广州，滇军部队进发至黔南镇宁时，得知六月十六日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先生被迫退驻永丰舰，旋即离穗至沪，号召讨逆，数次电召张开儒与朱培德合力讨陈。张将率部五个旅分为左右两路，先父率左路，杨希闵率右路，约定在柳州会合，然后东下讨陈。会师柳州后，滇军分驻桂平、大湟江、蒙山一带。这时桂军请滇军帮助收拾桂局，组成滇桂联军，以前黔军总司令卢焘为总司令。卢焘为利用滇军力量攫取广西政权，分别以广西省长、柳州镇守使等职引诱滇军各旅长。于是滇军内部出现意见分歧，一部分人想留驻广西，养精蓄锐，重新整顿部队返滇倒唐，而先父与张开儒则力主东下讨陈。双方争执不决，因而滇军赴粤行动迟缓，孙中山知道这个情况后，便亲下手令，派杜韩甫与刘德泽促滇军东下讨陈，杜韩甫因病未往，致函敦促。稍后，滇军诸将以张开儒年纪大，力不从心，不合时宜为由，脱离了张开儒，推举杨希闵为滇军总指挥。时先父仍力主东下讨逆，得到多数支持，滇军乃拔师东下，先父在促滇军东下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

滇军抵达广东蒙江口后，杨一面派代表到香港见孙中山的驻港代表邹鲁，表示要东下讨陈，拥护孙中山；一面委先父和蒋光亮为代表访问广州，伴与陈炯明周旋，诈称滇军志在返滇，求其援助。陈逆也正想利用滇军统一广西，

巩固自己后方阵地。因此答应给滇军不少钱财和军需补给，并约定滇军帮他统一广西后，全力支持滇军返滇倒唐。商妥后陈即拨付滇军广东毫洋十万元，军服一万二千套，干菜若干船，并对军官送了白兰地酒。在此期间，杨希闵又派第一旅旅长杨池生部副团长那博夫到上海面见孙中山表达滇军愿入粤讨陈的赤忱。此举深得孙先生嘉许，复电滇军，令成立“讨逆军”，委杨希闵为讨逆军总司令，并命孙科到澳门筹款十五万元供滇军开拔之需。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六日，当陈炯明赠送滇军的物资载满船只，由师长刘震寰、陈章甫亲送蒙江交付后，滇桂粤军的杨希闵、沈鸿英、刘震寰在广西白马会盟，决定三军合力讨陈，称“西路讨贼军”。讨贼军先会师梧州，然后分左右两路沿西江两岸东下。先父与刘震寰部为左路，官兵士气激昂，军威大振，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很快逼近广州。陈炯明不支，溃退至东江、惠州，负隅顽抗。一九二三年正月初二日，各路联军陆续开进广州。滇军驻扎三水、佛山和广州市中心至西关一带，先父部驻省长公署。联军驱赶陈炯明后，孙中山先生由沪抵港，滇军即派员前往香港迎接孙先生回穗重组大元帅府。孙中山到穗后设大元帅府于大沙头士敏土厂，继任大元帅主持大计，并以胡汉民、唐继尧为副帅，唐拒绝就任。联军以复粤有功，不久诸将晋级。滇军编为四个师，杨希闵仍为滇军司令。第一师师长杨池生，第二师师长杨如轩，第三师师长为先父，第四师师长蒋光亮。另还有第二混成旅，旅长为胡思舜。

一九二三年夏，桂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沈鸿英与北洋军

阀吴佩孚勾结，接受任“广东军务督办”的伪命，阴谋叛变孙中山，秘密将其部队移向广州北郊。孙中山察觉沈的行动，命先父率部防守北郊。四月沈突率所部由韶关袭击滇军总司令部，孙中山亲自与先父一起督军指挥，在白云山瘦狗岭一带展开争夺战，经过两天的激烈战斗，滇军虽死伤较重，八团团长潘宝寿阵亡，终于迫使沈军退出韶关，但沈不甘失败，勾结江西北军邓琢如第九混成旅，直犯广州，利用火车头冲锋，攻势很猛烈。滇军顽强抵抗，阻击于军田，七团团长杜心如阵亡，官兵死伤较重。但因指挥有方，全军士气始终保持旺盛，终于转败为胜，击溃了沈、邓两军，保卫了广州革命政府。不久，沈鸿英再犯广州，激战于英德。联军第一师由朱培德部打正面，先父打右翼，互相密切配合，协同作战，终于再次将沈鸿英部击溃窜逃，扫清了广州及其周围的敌军。沈部被讨平后，先父兼任江防司令，率部进驻广东兵工厂，控制了税收机关，滇军的枪械弹药补给大大改善。因此，当时在孙中山革命旗帜下，先后云集于广东的军队，有滇、桂、粤、湘、鄂、赣、豫、晋、陕等各军，其中以滇军装备最好，实力最强。在两次击沈战役中，滇军也很英勇顽强，因而滇军也颇为孙中山先生所倚重。不久，乃编滇军四师为三个军。滇军总司令杨希闵兼第一军军长，先父任第二军军长，蒋光亮任第三军军长。

一九二三年下半年，陈炯明向广州反扑，派洪兆麟首先将散驻粤东南各地的许崇智粤军部队各个击破。十月，陈军向广州方向大举进攻，洪兆麟军攻到石龙，直接威胁广

州。孙中山先生急令各军反击，刘震寰、许崇智、李福林等部作战不力，在敌人攻击面前溃如山倒。陈炯明派悍将洪兆麟乘胜攻占大花桥。石龙车站为广州门户，而大花桥又为广九铁路的咽喉，战略地势极为重要，若大花桥不守，则石龙必失，进而广州必陷。在此十分紧急的情况下，十一月十四日，孙中山乃派滇军二、三军，分左右两路，向石龙方向前往堵击，先父的第二军居左，第三军居右。孙大元帅亲自率军并督师克复石龙，指挥大花桥战役。时有杨希闵第四旅朱淮部属排长胡彦（后任某军旅长，解放后在云南省政协工作）在博罗负伤，送广州就医，路过石龙车站，曾目睹孙大元帅署名的横幅大布标，上面写着："有后退者，军法从事"字样。先父所属滇二军在大花桥左侧，孤军深入，形势严峻，有被歼之险；而滇军第三军在大花桥右翼，中隔大江，无法声援，且大元帅石龙得胜消息，又未传到大花桥一带。故而滇军第二军处境险恶，先父情急中乃率全军蓦然反攻大花桥。鏖战半日，几进几退，双方争夺此桥，滇军屡扑不克，死亡惨重，大有溃败之势。在此危急关头，先父身先士卒，大呼："广州存亡在此一举，我军存亡也在此一举，望弟兄们发扬我滇军战斗的传统精神，随我冲杀！"。于是滇军士气复振，杀声震天，以刺刀肉搏，终于夺得大花桥，一鼓作气杀退了洪兆麟敌军，迳向石龙，与孙大元帅会师。大花桥一战，既巩固了广州的安全，又保全了滇军第二军的存在。第二天，广州报纸以头版头条大字标题登载："范石生大花桥之战，有日本古名将风。"（比拟日俄战争中，日本名将东

乡平八郎在战前对士卒号召称："日本存亡，在此一举。"士气大振，遂一举战胜帝俄一事）。

大花桥战役的胜利，使广州转危为安，由于先父在此战中建立了奇功，孙大元帅为表彰他的功绩，亲题书赠"功在国家"和"军中有一范，顽敌心胆颤"的条幅，並赠送一柄大军刀及一副金刀链，链坠上刻有先父战功及"孙文赠"等字样，还有一套绣金梅花边的上将军礼服，以资勉励，并亲自书写授予先父上将军衔委任令。（后来先父将"功在国家"寄回昆明刻石为碑，立于近郊王家桥附近祖父范禹门墓侧以育后人）。从此，父在驻粤各军中，声誉日隆，盛极一时，孙大元帅每有事都常亲与商量。以后，滇、桂、粤等诸军合力围攻东江惠州时，孙大元帅令滇军出师，滇军一、三两军常以发饷为条件要挟，甚至暗中与陈勾结，而先父则每次都无条件地服从孙大元帅调遣，且屡建战功，故当时有"滇军除范石生外，余不可靠。"之说。

大花桥战后，先父率军乘胜追击溃敌陈炯明，正当陈将就擒时，忽奉大元帅电令返部。先父接电愤极，返广州后，即驱车询问大元帅："我军将擒陈逆，而大元帅突下令召回，是谁下的令？是谁拟的电稿？"。时蒋介石在元帅府任上校参谋，颇得孙大元帅信任，乃起立答道："此电乃部下所拟。"父举目怒视，狠狠训斥蒋介石。孙大元帅见势即来劝阻，并将我父拉开，彼此不欢而散。而后，蒋仍常下气前往谒父，均为父冷落，每次来见，蒋必在外面伺候良久方得传见。从此，蒋含恨在心，这成了日后与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